



“九零后撑台”的现状令人对科教前景不寒而栗

春节过后,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在京隆重召开,年届90的建筑学家吴良镛和91岁的物理学家谢家麟,分别以他们在人居环境和粒子加速器方面的突出成就荣膺国家最高科技奖。从2月15日的报道得知:该奖设立12年来,不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已经是出现第8次空缺,20位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中的15人,其年龄竟高达80岁以上,其余4人也在70岁到80岁之间,低于70岁的仅有1人。而且,这些获奖的院士大多数有海外求学历。看到这些年逾古稀,堪称我们爷爷奶奶甚至太爷爷太奶奶辈的老人们,迈着颤巍巍的步子走上领奖台,我心里涌上来的既有对这些老科学家成就的感慨,更多的是对国家科技后继乏人的酸楚。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至今近63个年头了,开办的大学数以千计,毕业生少说也在千万以上。人们有理由质问:

当中国在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上能实现一个又一个突破的同时,为什么就不能在自然科学上也弄它一两个诺贝尔奖回来,给咱这个国家也争一回光,给咱这个极爱面子的民族也露上一回脸?可是期盼归期盼等待归等待,年年岁岁年年,如今留给大伙的依然是:“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其实,关于养了这么多这么久的母鸡,为什么就产不出一个“金蛋”的讨论,30多年前就开始了,为此形成的材料可以说汗牛充栋。当年曾将原因归结于“四人帮”等错误路线的干扰,但随着一位西方学者讲到一个国立国20年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观点的广泛传播,加上时间的推移,这种论调自然无法自圆其说了。后来又有大量研究者将之归结为经费的不足,然而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壮大,尽管教育经费依然没有达到占国民经济百分之四的比例,但国家动辄给

一些高校斥资十几亿和科研经费不断追加,眼看着一个个大学和科研院所不断升级,办公大楼和领导层楼下的坐骑不断更新,但随随着民国时代培养出的大师们的身影渐渐远去,真正的“大师”却越发展成稀有动物了。

终于有清醒的学者找到了问题的病根——在于存于教育科研领域根深蒂固的“官本位”体制,和缺少“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的科研氛围。他们引经据典说:当年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认为大学的中心应该在教授和科研。他们还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即使是在根本谈不上有充足办学资金、实验设备,在颠沛流离的战乱环境下,仍培养出了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在内的大批举世闻名的专家学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屠呦呦、郭永怀、

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还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近百人。在社会科学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朱自清、陈寅恪、冯友兰、沈从文、钱锺书、费孝通等等。

对于西南联大的奇迹和如今高教科研现状的忧虑,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的钱学森曾感慨: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独创的东西,缺乏创新精神。在去世前留下了没有答案的“钱学森之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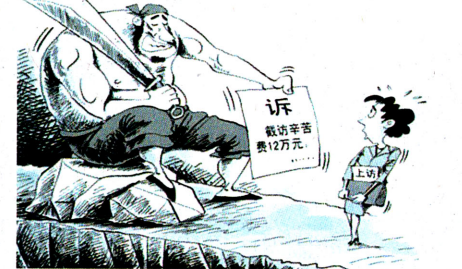
正如发现了爱滋病不等于就能很快医治好一样,教育科研领域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病因被找出后,这些年里不但没有得到任何遏止,反而随着大学盲目扩招、合并反而发展得更加“甚嚣尘上”了。高校排名,让校长们像藏犬似地盯住了官员手中的钞票;教授们则像没头苍蝇般,追逐着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的诱

惑;教授、博导争相竞聘后勤处长,官员由一礼堂扩充到了一操场,随之,学历、论文抄袭造假,丑闻与绯闻齐飞。本身就严重越界的行政权更肆无忌惮地侵害着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无限扩张的大学校园里居然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以至于近日如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这样有良知的学者不愿同流,只能被逼“挂冠而去”。这类“劣币驱逐良币”的闹剧不停轮番上演,这才是中国科技难以突破瓶颈的症结所在。

就如前日经济学家张维迎感慨的:当年救出“傻子瓜子”老板年广九出牢狱的小平先生不在,如今没人能挺身而出拯救美女老板吴英一样,由当年改革设计师担当全国科研“后勤部长”的时代也已经成为历史。当下,走入死胡同的中国教育科研的出路难觅踪影,顶层设计又长期缺如。对此,怎能不令人叹惋再三。(郝振宇)



索要“截访费”



深圳市福田区小南园林女士因为和管理方的纠纷,15次上访,诉求没解决,却被福田农批市场起诉索赔“上访损失”。福田农批称,林女士15次上访他们派遣的保安员以及出动车辆,按照6000元/次计算,共造成直接损失90000元,此外,他们认为林女士应承担应急小组人员工资28800元。(综合)

2月13日,广东省政协常委、市中心城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宏就市中心城“涉嫌违规售楼”一事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中途,她与一名女记者起冲突,并飞拳殴打该名女记者。在广邀媒体记者召开新闻发布会上,不仅有政协常委眼中的“几个小业主”手拉横幅“胡闹”,还有飞拳殴打女记者的武打动作,加上“我打你怎么了”的放言,令人不寒而栗。

而身为省政协的常委,理应知道民主监督是政协的主要职能之一,为何对媒体的监督如此震怒?这不由人心生疑惑:这个政协常委为何是如此的素质?其脾气大是一时冲动还是一贯为之?她平时又是如何履职的?

根据有关文件,人民政协要求政协委员同各方面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广泛、及

时地反映社会的事实情况和群众的意见呼声,也要求政协委员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注重委员的社会影响。打记者的政协常委的言行与作派,社会影响极坏,与一个政协委员应有的要求不符。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二十九条,政协委员如果严重违法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由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分别依据情节给予警告处分,或撤销其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的资格。

公众无意于偏袒哪方,希望广东省政协能够澄清事实。如果事情属实,就该考虑是否撤销打人的政协常委资格,不能以一个轻飘飘的“道歉”了事。(斯涵涵)

在近日召开的第十二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年会上,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称,自去年七八月开始的金融风暴,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到温州人头上。他还说,其中有一些企业家,跳楼、自杀,把命都搭进去了,这种方式不可取,但这恰恰是企业家的精神。

自去年以来,温州不少老板纷纷“跑路”,身后留下巨额债务,以及扯不清的民间金融纠纷。但如果把这种方式视为老板们在捍卫信用,是中国企业家精神和开拓市场精神的体现,无疑很值得商榷。

很难想象,一个对自己生命都不懂得珍惜,一个对亲人、对家庭都不负责的自杀老板,又谈何信用?他选择一死了之,可留下的一堆问题又该怎么解决?抛下烂摊子不管,一走了之,玩人间“蒸发”,或者用结束生命的方式逃避现实问题,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老板所为。企业发展也有自己的伦理,企业家作为企业的掌管者,置员工于不顾,置几十亿元债务于不顾,说是诚信可嘉未免太高调了。更何况造成企业现有的窘境,老板自身的经营管理混乱也是原因之一。

企业经营有成功,难免也有失败,乔布斯创建了“苹果”,后来又赶出了“苹果”,最终他又拯救了“苹果”。靠的是什么?是不服输的创新精神。倘若“跑路”老板回心转意,决定推倒重来,说不定还能再创辉煌。但那些跳楼自杀的老板,除了给人留下叹息和唏嘘之外,还能留下什么呢?

敢于终结自己的生命,确实也需要一定的勇气。但如果非要老板的跳楼、自杀提高到企业家精神的层面,恐怕是对企业家精神的误解乃至亵渎。依此而论,每一

“跳楼自杀”不是企业家精神

个遇到经营困境,乃至难以生存的老板,最后都可以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死谢罪,因为这才符合企业家的精神,岂不是很荒唐?

温州模式之所以一度扬名海内外,离不开温州人早期那种不怕苦的创业精神和大胆的创新意识,从而促成了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但也应该意识到,现在有不少陷入困境的企业,并不是因为做实体经济遇到了多大的困难,而是沉迷于高利贷的“钱生钱”游戏,导致企业发展理念的错位。

当然,也应看到那些跳楼自杀的老板背后,民营经济发欠金融渠道,民间金融不够开放的现实困境。要让企业家精神得到体现,前提是要有一个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市场。权力减少公平配置资源,才能培养出真正有出息的的企业家精神。(李龙)

DUSHU

读书

不读童话的人生是匮乏的人生

我喜欢读童话,越是人近中年,越觉得童话的好。尤其是那些不朽的童话,我们年轻时读过,成年时再读,真会有温故而知新的感觉。所以无论是童年、少年还是青年,都不应该将时间花在读那些无聊的书上,因为人的生命短暂,而好书又那么多,如果不把有限的时间花在经典上,简直就是浪费生命。在小说《挪威的森林》里,村上春树虚构了一位名叫永泽的大学生,永泽酷爱读书,但他有一个原则,即出版50年之内的作品不读,因为没有经过时间的淘洗,书籍很难被确认为真正的经典。

所以我很感激我是在30岁之后才读到《小王子》的,这个时候,离圣埃克絮佩里写出这个童话,已经70多年了。尽管我也曾想,要是能在十三四岁时就第一次读到这本书就好了。因为人最幸运的事情,莫过于在合适的时候,读到合适的书籍。但我仍是感激,因为30岁之后读的好处在于,我也会比十三四岁时更懂得《小王子》这个童话。于是心灵开了窍,突然明白了很多以前细微的道理,就像一些细枝末节,本来堆在心里面不曾清理,现在一下子贯通了,能够感受到更多的情感纹理和枝脉。比如很多人喜欢狐狸说的“驯服”这个词,因为喜欢一个人,从而这个人所有的一切,就都会喜欢。因为喜

欢小王子,所以也会喜欢橙黄色,于是也会喜欢麦田的颜色。因为知道喜欢的人即将到来,那么那种等待就会焦急而充满甜蜜。那只狐狸,是童话中的一个智者,他教给小王子的,也正是教给我的。我不知道,若在匮乏的童年读到此书,我的人生将会会有什么不同。所以,读过《小王子》之后,我就把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读过《小王子》的,一类是未曾读过《小王子》的。就像圣埃克絮佩里在文中说的,他跟成年人交往,先给他们看那幅蟒蛇吞吃大象的画,如果成年人说这是一顶帽子,那么,基本就可以断定,这个人你该跟他谈股票,或者楼市。

我在30岁之后还感激另一本叫做《夏洛的网》的童话。起先是在网上读的,一个叫肖毛的网友的译本,后来拿到了上海译文社任溶溶的译本。后来,我又看到了《夏洛的网》的电影,非常好的一个动画片,我都不知道美国人是怎样拍出来的。

一般而言,一只春猪的命运,无非在春天出生,被饲养,然后在圣诞节来临之际被屠宰,做成培根,装点节日气氛。然而威尔伯,却成功摆脱了这种命运,创造了奇迹,成为第一个成为州吉祥物而广受瞩目的猪。这个奇迹是威尔伯和夏洛等朋友们共同完成的,其中蜘蛛夏洛的坚持自然最为重要。但关键在于,为什么夏洛可以这样无私地帮他?因为在整个牲畜栏中,只有威尔伯给予了夏洛真正的友谊、尊重和爱。威尔伯是牲畜栏里第一个确认夏洛价值的。这是因为威尔伯的善良,他看到世界是美好的,所以所有的动物都是美好的,他由衷地称赞夏洛的工作。友谊建立在互相的信任之上,这种信任,正是我们温情的源泉和持续的能量。因为威尔伯和夏洛的努力,这个牲畜栏成了最为闪耀着善良温暖之光的牲畜栏。所以有人说,天堂与地狱,仅在于你自己一念之间。

这个关于奇迹的故事,总让我想起另一个美国故事,

《海鸥乔纳森》。乔纳森也不甘于自己的命运。海鸥多,数数海鸥的一生,无非是跟在轮船后面,找些人类丢弃的死鱼烂虾填饱肚子,然后在岩石上打盹,千万年来莫不如此,将来也如此。可是有一只叫乔纳森的海鸥,却不停地练习飞翔,他想要像老鹰那样飞翔。他不但要忍受自身程度的限制,还要遭受整个种群的不解和嘲笑。但最后,他做到了。这是又一个关于奇迹的故事。

还有一本书,也许不是童话,但至少我将之当做童话在读,就是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但这是一本反童话的童话。自由飞翔诚然很美好,但有的时候,藉着自由飞翔的口号,却可能造成匍匐和奴役。动物庄园的革命,赶走了人类庄园主,而新的统治者,却以平等的名义,发明了新的不平等。所以,奇迹的反面,可能就是噩梦。噩梦是美好奇迹的反向延伸。而我们的阅读,当然要看到世界的美好与善意,同时也应该警惕,良好的愿望也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因而,程序的正义,才会得到公众普遍的关注。与《动物庄园》相似,德国拍过一个叫做《浪潮》的电影,有一个影评的标题为:从自由到奴役,仅需要五天。正因为梦想与奇迹是脆弱的,才需要我们尽力呵护;同时我们仍是相信奇迹,因而我们终认为这个世界会好的。(阿晴)

写散文三十余年,在报刊发表文章近千篇的朱耀儒先生,继《校园的馈赠》、《心窗幽泉》两书出版之后,最近又推出了他的第三本散文集《篱下絮语》。

这本35万言的书收录了130多篇散文,谈了他近年来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读过此书,回味无穷,感受有三,曰质朴,曰清正,曰厚重。

先说质朴。耀儒的作品,首先是真实。他在文中所写的故乡的水窖、窝棚、村戏、石磨、涝池等地方风物,稍有农村生活常识的人,莫不感到真实可信,“确是那么回事”;所写的乡亲父老,其笑谈风貌,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形神毕肖,把个渭北人的淳朴厚重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写的那些民风民俗,如新娘拜拜子等,情趣盎然,有滋有味,读后不禁使人联想起翩翩,仿佛回到童年时期。其次就是朴素自然。耀儒写人状物,不事雕琢,朴实无华。他不喜欢用华丽的辞藻,不喜欢添加油加醋,故意制造悬念。再次是感怀抒情,有他自己独到的方式。他所表达的感情,大都是感恩之情,愧疚之情,感激之情。他感激父母,感激乡亲,感激为他提供助学金的政府,感激给他启迪的老师。在生活中,有一种实诚人,心里热,外表凉。心中波涛汹涌,但要对对方的面,千恩万谢,好话连连,却说不出口。耀儒的抒情方式就是这样的,他没有感情色彩很浓烈的话语,没有大段的心理独白,他只平静地叙述他的事实,他靠事实去打动人。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发:一是散文的抒情,不光是作者要“抒”,关键是读者要“感”,要引起共鸣。有些散文,作者说得很动情,哀婉凄绝,痛彻心肺,读者却毫无感觉,那就不行。二是怎样抒。说许多动情的话,发很长的议论,不是不行,而不是惟一的途径。耀儒的抒情方式是,不太说动情话,一味平静地叙述事实,听任感情在事实的铺叙中流淌出来,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当然,这就要在素材的取舍上,细节的选择上下功夫,看似没有技巧,其实就是技巧。我最佩服耀儒的是,什么物件到了他手里,都能变成文

乔治·奥威尔的《1984》再版

由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傅惟慈译、被列为“现当代世界文学丛书”的《一九八四》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

《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是奥威尔的传世之作,堪称世

界文坛上最著名的政治讽喻小说。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已收入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了“一个形容词‘奥威尔式’不断

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笔下,足见其作品在英语国家影响之深远。

“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有评家如是说。(凤凰)



章。像石磨子、瓜庵子、看秋、灌黄鼠、杜梨、桑榧、软枣等等,这在农村都是惯见的东西,他都能把它们形诸笔墨,赋予一定的意义,或遣怀寄情,或歌颂时代的深刻变化,或追忆个中的情趣,或对某些东西的消逝感到惋惜和无奈,可谓半是颂歌,半是挽歌。

所谓清正,就是文章中充塞着一股正气,一股清气。耀儒先生跻身文坛多年,对于文坛情况熟悉。文坛是个圣洁的地方,作家是个受人尊敬的职业。面对商品经济的大潮,文坛出现了许多和它身份不相称的事情。对此,作者在书中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评。对于不去深入生活,不去表现火热的现实,以“女人”来装演影视作品,把文学作为表现自我的工具等现象,都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和犀利的斥责。作者痛心疾首地说:“这实在是文学的悲哀,文坛的不幸。”在当前物欲横流的形势下,敢于有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对钱说“不”,太不容易了!基于捍卫文学纯洁性的考虑,作者对忠诚于文学事业,热爱人民,热爱生活,充满正气,呕心沥血,“只将笔墨赋黎民”的作家,表示由衷的敬佩,不惜笔墨把他们的事迹介绍出来。

对本书的厚重之感,主要来自最后一辑“文化纵横”。这辑读后,感到内容丰富,史料翔实,色彩斑斓,沉甸甸的,很有分量。充分显示了作者渊博的知识,深厚的功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那种授业解惑、孜孜不倦的人文关怀精神,也给人留下了强烈印象。在这辑中,他跋涉海内山,披沙

掘金,旁征博引,介绍了陕籍的关学大师张载、杨恭懿、李二曲,报界宗师张季鸾,学术大师吴宓,“左联”开创者郑伯奇和教育家胡绳等。同时,采用“诗抒”的形式,大量援引古典诗词,蒐集轶闻趣事,把一年间四时自然风光、节日习俗、民间活动、飞禽走兽、花卉蔬果、器物用品等等,逐个道来。绿柳、红荷、黄菊、雪梅等入“画图”,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再现风姿,还有春燕、秋蝉、团扇、清茶等等,这些篇章,对读者大有裨益。(张兴轩)